



● 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足迹与心迹

西学东渐记

容闳 著 沈潜 杨增麒 评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西学东渐记

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缩影

作者：[美] 费正清 著 林文范 译





● 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足迹与心迹

西学东渐记

容闳著 沈潜 杨增麒 评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醒狮丛书

谢俊美 主编

西学东渐记

容闳 著 沈潜 杨增麒评注

责任编辑 张燕萍 责任校对 陈兴华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88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ISBN7-5348-1716-1/C·11

定价:11.00元

《醒狮丛书》总序

《醒狮丛书》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这里我想说几句话。

1997年冬，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郭孟良先生和张燕萍女士风尘仆仆从郑州来到上海，邀我主编一套有关介绍近代思想家名著方面的丛书，想以此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近代国情的了解和认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他们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想法非常好。其实，江泽民主席近几年来一直要求我们加强近代史的学习，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们的编辑计划得到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鉴于此，我虽不才，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其次，我想要说的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什么要不惜花大力出版这类盈利不多的著作呢？我想自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一番道理。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历史研究乃至出版计划，往往都是从现实社会需要出发，再到历史中寻求答案。随着社

会历史的飞速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内部资源的极度匮乏,不少人对于历史知之不多。由于多数中国人对“改革开放”的“变局”,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和理论上的探讨,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多次出现了历史上重复出现的现象:八九十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先是鼓吹新儒学,大倡文化复兴,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建设的动力。苏联解体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又鼓吹西方中心论,把西方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所谓方法论,乃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理论,也不顾这些理论原生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的文化目标,一股脑儿地介绍到中国。其中有些理论、主张由于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不合中国国情,很快退出了文化舞台而销声匿迹。不过,透过这些言论、主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仍然没有超越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之争这一范畴。从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思想文化领域的中西文化之争实际上是近代史上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和深化,是国人在国门打开后,有鉴于国际社会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深感自己落后,急于寻求迅速改变现状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争论的表层好象是现代化问题,实际内里还是一个如何看待西方的近代文化和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问题。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拍击中国的堤岸,进行殖民侵略,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从船炮器械到声光化电之类的科学技术,从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到民主、人权乃至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等等,并日渐同

中国传统的文化发生抵触乃至冲撞,由此而引发了中西文化之争。由于民族战争的一再挫败,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承认和看到了西方的长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学习西方这一著名的历史课题。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围绕着学习西方,士大夫官僚知识分子先后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中西折衷调和、全盘西化等等主张。这些主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都是在近代中国国情制约下,特定思维模式的产物,它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因“世变之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心路历程。

翻阅历史,我们发现,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常常为新的主张而陶醉,又常常为每一次新的迅即失却而变得痛苦不堪,并为企盼下一个更新的主张而激动不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采西学议”,王韬、郑观应公开鼓吹设议院,而容闳则干脆将他所了解和学到的西学知识投诸于他的斗争活动。然而随着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人们对“中体西用”产生怀疑。在国家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严复站在救亡图存的反侵略立场,译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搬来了西方的生物进化论,向人们大声疾呼:若再不变法,中国难逃“优胜劣败”、弱者灭亡的厄运。由此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谭嗣同则提出冲决一切罗网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了维新变法,孙中山等发动和领导了反清

的辛亥革命,企图“西体中用”,即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拯救民族危亡。然而变法的失败和革命的夭折,又一次使他们陷入痛苦和悲哀之中。在流亡异国的日子里,康有为撰述了《大同书》,企盼大同世界的出现,然而他乃至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始终也未找到一条实现大同的道路。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开始改变由原先对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层面楔入进而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从中西间的形而下的比较进而采取形而上的比较,从而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发表了《新民说》,提出了国民性改造。孙中山在屡经挫败后,重新构思新的建国方略。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则揭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出塑造现代人格的呐喊,主张实行观念形态的革命,进行文化重建。新文化运动中除旧布新的若干内容,时至今日还灼然有华。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每一场争论,时而给人以惊吓,时而又给人以力量。这种争论构成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绚丽多彩的画卷,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近代史上的中西文化之争早已有了结论。历史告诉人们,东西方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各有其成就和局限以及自身存在的价值,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近代史上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求真理而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评判,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只是相对于现代化的目标而言,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远远落后于生活,接受和吸纳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不可规避的事实,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探索,直到五

四运动前夜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最高结晶——马克思主义。又经过三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最后实现了民族独立,成功地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斗争活动以及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认识和见解、主张,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我想这大概就是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意图吧。

最后,从编辑本丛书而联想到今天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问题。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忧危国家的前途命运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个人的历史可以有轻浅,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大业犹如大海巨川,波澜壮阔,汹涌向前。人文知识分子不应为目前的困难惆怅和忧伤,不应弃守自己的阵地,应当像历史上那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的呻吟和独立富强的热望交织中,毅然决然投身社会,追踪时代,大胆探求真理。社会经济运作机制的大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种守恒力量,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重塑自己,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重建贡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让我们为繁荣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共同努力吧。

谢俊美

1998年1月于沪上

目录

醒狮丛书总序·····	谢俊美(1)
容闳与《西学东渐记》·····	沈潜 杨增麒(1)
容闳生平及其思想·····	(1)
《西学东渐记》写作背景和经过·····	(11)
《西学东渐记》的主要内容·····	(16)
《西学东渐记》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评价 ·····	(46)
自序·····	(65)
第一章 幼稚时代·····	(67)
第二章 小学时代·····	(73)
第三章 初游美国·····	(78)
第四章 中学时代·····	(82)
第五章 大学时代·····	(86)
第六章 学成归国·····	(90)
第七章 入世谋生·····	(97)
第八章 经商之阅历·····	(102)
第九章 产茶区域之初次调查·····	(108)
第十章 太平军中之访察·····	(115)

第十一章	对太平军战争之观感·····	(122)
第十二章	太平县产茶地之旅行·····	(126)
第十三章	与曾文正之谈话·····	(131)
第十四章	购办机器·····	(139)
第十五章	第二次归国·····	(143)
第十六章	予之教育计划·····	(147)
第十七章	经理留学事务所·····	(152)
第十八章	秘鲁华工之调查·····	(157)
第十九章	留学事务所之终局·····	(160)
第二十章	北京之行与悼亡·····	(169)
第廿一章	末次之归国·····	(172)
第廿二章	戊戌政变·····	(180)
附录	吐依曲尔氏之演讲·····	(184)

附录一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西学东渐记》 的研究综述·····	(197)
-----	-------------------------------	-------

附录二	《西学东渐记》出版后主要研究 著作、论文举要·····	(228)
-----	--------------------------------	-------

后 记	·····	(235)
-----	-------	-------

容闳与《西学东渐记》

容宏生平及其思想

众所周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同时也是先进的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而探索奋斗、颠仆竭蹶的历程。我们要在这里介绍的《西学东渐记》一书,它的作者容闳,(1828年—1912年)正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代表人物。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署名 Yung Wing(又译作 Jung Hung),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起入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夫人所办的教会学堂读书,13岁又入马礼逊学校。从1847年起随美国传教士勃朗赴美留学,先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1850年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855年回国,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翻译处和英商宝

顺洋行等处任职,并自由经商3年。1860年曾去天京(今南京)与洪仁玕商谈革新图强的建议,为太平天国出谋划策,未被采纳。1863年经友人介绍入曾国藩幕,被委为出洋委员,随即赴美购买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1865年归国后出任江苏行政署译员,驻节上海,倡议设立兵工学校以储备人才。此间一度在扬州译述了美国人哥尔顿的《地文学》和派森的《契约论》等著作。1868年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条陈并请转呈总理衙门上奏,以设轮船公司、开矿筑路和限制教会权力为陪衬,着重提出派幼童出洋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经曾国藩、李鸿章专折会奏,奉旨允行。翌年担任留美学生事务所副监督,受命负责有关事宜,每年派送30人,分4批完成。1873年在家乡出资办学,创立“容氏甄贤学校”(今南屏镇小学)。1874年在沪发起创办了《汇报》,竭力鼓吹西学。不久赴美转往秘鲁,调查当地华工实况。1875年冬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钦差副公使。次年在美获耶鲁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学位。该年曾应郑观应所托,物色美国纺织专家,协助规划上海机器织布局。1881年因清政府撤销留美学生事务所,提前撤回全部留学生,回国述职并销差。1882年再度赴美,留居13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两度投书张之洞,建议实施新政,后应张氏电招回国,面呈变法自强之法。稍后受两江总督刘坤一任命为江南交涉员,不久辞职,去上海自设办事处。1896年拟具一系列银行章程和有关条陈,包括《银行总纲四条》、《总行章程十二条》、《分行章程二十四条》和《续拟银行条陈六条》等,筹建国家银行的计划前往北京,在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支持赞同下奏请批准,终因盛宣怀的从中阻挠而受挫。同时提出修筑天津至镇江的铁路计划,虽得到了光绪帝的允准,最终亦在内外反对势力的夹击中未能实施。1898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多有交谊,热心参与变法维新活动。戊戌政变后逃离北京,托迹于上海租界。1900年在

沪参加唐才常主持的“中国国会”，被公举为会长，亲自起草国会对外英文宣言，力主排满勤王。自立军失败后，因清廷通缉捕拿，不得不亡命出逃。避走日本途中，与孙中山巧遇，由此倾向革命，随之参与了兴中会在香港的革命活动。1902年离开香港赴美国定居。此后数年间与谋求改造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多有联系，主张联合反清。自1909年与孙中山再次会晤，更加支持革命派事业，为此商议借款事宜，筹划武装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先后寄函国内友人表示祝贺。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致函相邀归国参加民国建设工作，因病未能成行。同年4月21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寓所逝世，终年84岁。

据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容闳的思想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比较显著的阶段：

第一阶段：1828年—1854年，这是他爱国维新思想的逐步形成时期。

出身寒微的容闳自幼接受西方近代教育，尤其是在美留学的8年（1847年—1854年）时间里，得以广泛而系统地涉猎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更耳濡目染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文教设施等情况，由此回望中国当时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使他痛感于故国家园的落后和黑暗，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能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以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能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西学东渐记》，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见此书）因此，在容闳的心中，“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的观念一直耿耿于怀。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这就是他在自传

中所明确表述的一段话：“予意以为，予之一身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一代，能象自己一样出洋留学，获得先进的西方教育，从而以西学改造中学，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可以说，正是在容闳远赴重洋的留学期间，初步酝酿形成了他致力于西学东渐的教育计划。

第二阶段：1855年—1895年。这是他学成归国后入世谋生更谋道，即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方案而历经艰难挫折的时期。

大学毕业后，容闳放弃了在美国获得优越职业和富裕生活的条件，毅然回国，开始为自己的教育计划能付诸实践而努力。但是最初的五年里，严醒的现实使他无以实施自己的救国理想，从广州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到处奔波，屡迁其业，也曾一度以经商为业，但容闳非常清楚：“既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若仅仅贸迁有无，事业终等于捞月”。于是人们可以看到，为寻求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道路，容闳把目光投向整个社会，密切关注并积极投身当时各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运动。在先，他抱着对太平军的同情和理解，寄望于太平天国革命而跃跃一试，提出了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和海军学校、建设善良政府、创立银行制度、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及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建议，内容涉及军事、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而其中尤以建立新式教育为基本，试图借此模仿资本主义进行改革。但在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之后，容闳对此颇感失望：“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由此断言：“太平军之行为，殆无造新中国之能力”。不仅于此，他还从中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和失败的原因，并给予高度评价：“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正是基于此种难能可贵的认识，容闳始终坚执初志，历久不磨。稍后，际会于洋务运动的

倏然兴起,使他把满心希望转而寄托在曾国藩、李鸿章等开明官吏身上,为此入幕赞襄,崭露头角,从此与洋务派建立了长达近二十二年之久的因缘,在此期间,他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热情倡导办报办学等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努力开展外交活动捍卫民族利益,可谓竭智尽力,颇多建树。特别是在丁日昌的支持下转奏清政府的四项条陈,包括组织中国合资汽船公司、选派幼童出洋留学、开采矿藏和修筑铁路,以及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等计划,无不反映了容闳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培养建设人才的迫切愿望,其中为他格外看重的派幼童出洋计划,一经付诸实施后,更是殚思竭虑,苦心经营,因为在容闳看来,“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显然这是他梦寐以求了多年的“教育计划”之核心,在一定程度上无疑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具有了超前的思想意义。凭实而论,从容闳参与洋务事业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来看,他与洋务派的宗旨迥然有别,前者以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强国为出发点,后者则从维护封建统治而立足。由此可见,容闳与洋务派的关系既是互相利用又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说此前因为容闳“西学东渐”的主张与洋务派“师夷长技”思想在谋求自强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得以联手将事,那么,随着洋务运动的渐次展开,思想宗旨的不同势必导致两者之间的最终分离。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容闳与洋务派在留学生事务所的裁撤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冲突,不难理解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半途而废的思想根源,也同样不难理解当全部留学生奉命提前撤回后,容闳愤然退出洋务运动的自觉选择。正如他事后追忆:“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然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

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由此可知,留学生教育计划的夭折,既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同时也让他从中得到了深刻的启悟。此后寓居美国的十多年,正可视作容闳处于思想困境中伺机再图振起的蛰伏时期。

第三阶段:1896年—1912年,这是晚年容闳从主张维新变法到最终拥护民主、倾向并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时期。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事实,使远在大洋彼岸而始终心忧国事的容闳更加感愤交加,再度激发了他的救国之心、报国之志。他当即致函于湖广总督张之洞门下幕僚蔡锡勇,主张向英国借款,购置铁舰,雇佣洋兵,坚持对日作战。随后专程回国面说张之洞,建议延聘客卿改革新政,即聘请外国人为中国政府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的顾问,并选拔年轻有为的中国学生“置于各顾问之下,以资练习”,认为“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容闳相信:“予谓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但此番热心却在张之洞似听非听中受到冷落。遭此挫折后,容闳改革中国的愿望却并未因此而改变。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唤起了人们思想上的空前觉醒,维新派的应时而起,标志着近代中国思想舞台上的主角转换,由此拉开了近代民族救亡运动的新帷幕。正是在此情势的催迫下,容闳感应着时代的脉搏,走上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起谋求变法自强复兴中国的新径,从而折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层次。在他向清政府提出设立国家银行和修筑全国铁路的维新计划均遭冷遇后不久,他决意留居北京,通过支持维新派来实现他救国的宿愿。此间,他与维新志士频频往还,互为推引,相启共发,所在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容闳以他的爱国主张和计划,对康梁等维新派领袖多有影响。证诸康有为上奏光绪帝有关统筹大局的改革方案,诸如筹款筑路、购铁甲